

存在

BEING
AND
TRANSCENDENCE

● 孙周兴/著

与 超超越

海德格尔
与
西哲汉译
问题

013045225

B516.54

54

存在^与 超越

海德格尔与
西哲汉译问题

孙周兴/著



B516.54

54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存在与超越:海德格尔与西哲汉译问题/孙周兴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3
ISBN 978-7-309-09499-2

I. 存… II. 孙… III. 海德格尔,M. (1889 ~ 1976)-哲学思想-德语-翻译-研究
IV. ①B516.54②H33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7695 号

存在与超越:海德格尔与西哲汉译问题

孙周兴 著

责任编辑/陈 军 方尚芩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 字数 91 千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499-2/B · 460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时代的潮流，总是在我身后流过，我只能在它的后面，跟着它走。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时代的潮流，总是在我身后流过，我只能在它的后面，跟着它走。

自序

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时代的潮流，总是在我身后流过，我只能在它的后面，跟着它走。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时代的潮流，总是在我身后流过，我只能在它的后面，跟着它走。

经常有业内同好问我，为何看你忙东忙西，还做出了这许多文字来？内子也经常地讽刺我，说：你像个机器，或者干脆就是个机器罢。我知道他们都是好心肠。尤其内子，自然是嫌我陪她、陪家人的时间少了，没了生活，更是怕我累着。有一回，她指着我译的尼采的《权力意志》上下卷和海德格尔的《尼采》上下卷（两者都是洋洋百万字的巨大块头），说：你说说看，不是机器是什么？

我倒真没觉得自己干了多少活。自 1992 年博士毕业后，正经干活已经有二十年了，不过写了四五本书（且多半是论文的合集），编、译了约三十本书——总量并不算多，平均下来，也就每年一本半。最近一些年以来，每年 1 月 1 日的凌晨，我都要正襟危坐，煞有介事地制订新年的年度计划（这已然成了我自定的一个规矩）。我对自己提出的基本要求是：每年写三篇论文，做两本书（写、编、译均算数）——仅此而已，实在不算高要求啊！

我一直以为，在中国当个教授，大抵还是比较轻松自在的。记得 11 年前，我去德国法兰克福访问哲学家阿佩尔(Karl-Otto Apel)教授，被问起中国教授的工作情况，我作了简单的介绍，这位阿教授听完，便说：你们中国教授很幸福呐，比我们德国教授惬意多了。这是真的，中国人多，教授也多，这年头人们对教授也并不当真了，有事没事，大家混着就是了；另外，中国人过于注重享受，发明了许多吃喝玩乐的名堂，正经的活儿不在多数。

——我想，我自然也是难以免俗的。

聊以自慰的是，我毕竟还喜欢干活，甚至是热爱干活的。就像此刻子夜，窗外是中秋夜的明亮圆月（城里是难得一见这等明月了！），太太孩子们都睡下了，而我还在写字。写字，现在是电脑前的码字，于我是必然的。再怎么说，人生根子上难免无聊和虚空，而写字这个活儿，是我稳定心思、抵御空虚的基本手段罢。

我出身农民，一直操着一口流利的“绍兴普通话”（可简称为“绍普”）。大概，对于母语的偏爱和固执，使我不可能讲好北方普通话（虽然我也在北方生活过整整 3 年），也自然不可能真正学好一门外语（尽管我学过英语、德语和古希腊语等）。我以为，这种固执是有地方性的，甚至可以有生理基础的。这里且不说“一方水土一方人”之类，在我看，个体先天的发声器官已经限定了发声方式和语言能力。

这就引发了一种“荒谬”：一个学不好外语的人如何可能翻译和研究外国哲学？——我对此尚无完全的解释。

不过,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为何会喜欢海德格尔的语言,相比之下,另一个同样占用了我大量时间的哲学家尼采的语言,就让我难得开心。众所周知,海德格尔确有乡土气和农民气。不只是性情,也不只是思想,语言表达亦然。乡土的海德格尔特别注重方言,德文“方言”(Mundarten),字面上本来就是“口之方式”。我曾在德国见过一本海德格尔与德国作家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合著的书(书名忘掉了),用的是施瓦本方言,估计讲德语“普通话”的德国人也没法读。不光如此,实际上海德格尔整个思想和表达方式都带有浓厚的农民式的直接和笨重,也带着一点点狡黠和阴险。有时候,这是蛮可以让人着迷的。

自诩为“波兰贵族”的尼采则有所不同。虽然断定尼采是“诗哲”、“诗人哲学家”之类可能有失简单,不免粗糙(据我了解,尼采的诗写得实在不怎么的,且尼采确有用“基本词语”编织和构造思想框架的能力),不过总的说来,尼采的思想语言倚重于诗文,多半比较放肆夸张,稳定性略差,词汇量明显偏大。

与之相反,在“词语的节约”和“表达的谨慎”方面,海德格尔可为思想家群体里的表率。思想的稳重本色需要词语的节约。我个人不喜欢读用词方面过于张扬的哲学家的东西。华丽辞藻不是真功夫。

在过去 20 年的学术工作中,我的主业是翻译(无非是鲁迅先生所讲的“阿狗阿猫”的事体),故而对于哲学翻

译、特别是对于哲学基本词语的汉译关注最多，从而也在不同场合发表过一些看法，在我出版的几本文集里（《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后哲学的哲学问题》、《边界上的行者》等）均有关于译事、译名的讨论文章。这就是说，收集在眼下这本书中的六篇文章并非我关于哲学翻译（学术翻译）的讨论的全部文字，其中一些想法也可能多多少少地在别处表现过了。不过，因为眼下的这六篇集中度较高，差不多可以勾连为一个整体，而且都是最近几年的新作，故似乎仍旧有必要把它们合册成书。

本书前四篇与海德格尔著作之汉语翻译相关，第一、二篇为会议发言，第三、四篇关乎海德格尔《哲学论稿》的翻译，本就附在中译本书后——我甚至把中译本附录中的“《哲学论稿》德—英—中译名对照表”也收录于此，以备读者查考和批判。本书后两篇文章则是作者对汉语哲学翻译的检讨和反省；但，即便在后两篇文章中，海德格尔也还是重要的论题，或者构成讨论的主要背景。

促使我把本书编辑、整理出来的一个重要契机，是2012年11月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召开的“海德格尔《哲学论稿》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由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也是商务印书馆启动的“学术论坛”的第一次，而讨论的课题正是我新译的《哲学论稿》（商务印书馆2012年）。我心里想，反正已经成了“大批判”的对象，何不索性彻底些，多提供些材料供大家参考和判断？于是就花了点时间来编辑本书。

就表达而言，所谓“现代汉语哲学”差不多是“翻译的

哲学”，或者说，“现代汉语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翻译的性质。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译词分析是现代汉语哲学从业人员的一项基本功。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的《哲学论稿》可以具有标本作用，因为它从内部发起了对欧洲哲学基本词语的重思、分析和解构，而且把这样一种工作做到了极端的地步。

也正因为如此，翻译海德格尔《哲学论稿》的过程历经五六年之久，让我饱受折磨，令我真切地体会到了翻译的“怕”与“忧”。

最后要来说说书名。本书书名直接采用了我刚刚发表的一篇长文“存在与超越——西哲汉译的困境及其语言哲学意蕴”的主标题（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即本书最后一篇文章），只是副题作了变动。蓦然回首，让我自己深感吃惊的是，“存在与超越”竟也是我二十多年前（1989年）的硕士论文的题目，只不过，这篇硕士论文仅讨论海德格尔前期的《存在与时间》，且作者当时初习哲学，眼界狭隘，消化力差，所论粗疏不堪，只是一篇羞于见人的蒙学位的东西；然而，论文的标题却是起得高大无比，现在想来，觉得自己当年仿佛还是有点志向的。

所谓“存在”与“超越”，并不是说我们要活着、要存在，我们要力争上游、要奋勇前进。Being 和 Transcendence，我把它们当作欧洲—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两个核心词语和基本课题，标志着以“本质—存在学”（essentia-ontologia）和“实存—神学”（existentia-theologia）为代表

的西方哲学文化的根本思想方式和精神品质——这自然也是受了海德格尔的启发。正因此，这个 Being 和这个 Transcendence，成了汉语学界最难译解的西哲词语，关于两者（以及与两者相关的词族）的翻译难题，至今仍然不断纠缠着我们。

现在，我用“存在与超越”这样一个高大无比的题目，来标识自己关于以海德格尔为中心的西哲汉译的具体讨论。——我想，这是可以成立的。

本书第二篇文章是关于《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的，中译者陈嘉映教授读完拙文后表示愿意接受文中提到的 transzendentia 译名建议（他原译为“超越的”，而我译为“先验的”）；另外他也表示愿采纳我关于 Existenz 的译名（他原译“生存”，我建议译为“实存”）。这是正派学风。我很高兴他能接受我的意见。嘉映兄顺便也指出了拙文的几处错讹和不当表达，在此谨表谢意。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柯锦华女士，她为本书最后一篇文章的扩充和修改花了许多心思。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贺圣遂教授愿意出版本书，他是我的老朋友了，承他的美意，才有眼下这本不像样的小书。

孙周兴

2012年9月30日于沪上新凤城

2012年11月8日晚再记

目 录

自序	1
学术翻译的几个原则	
——以海德格尔著作之汉译为例证	1
基础存在学的先验哲学性质	
——从《存在与时间》的一处译文谈起	16
海德格尔《哲学论稿》的关节和脉络	37
海德格尔《哲学论稿》几组重要译名的讨论	53
附录一：《哲学论稿》德—英—中译名对照表	70
附录二：失败的西哲汉译？	82
翻译的限度与译者的责任	
——由安乐哲的汉英翻译经验引发的若干思考	91
存在与超越	
——西哲汉译的困境及其语言哲学意蕴	110
参考文献	142

学术翻译的几个原则

——以海德格尔著作之汉译为例证^①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以海德格尔著作的汉语翻译为例证,提出学术翻译的四个原则,即“语境原则”、“硬译原则”、“统一原则”和“可读原则”,并且依次做了解说和论证。文中传达出作者所主张的尊重母语语境、字面意义优先、软硬相济相宜的学术翻译理想。

这个题目应该是清楚的,我们主要是谈学术翻译。学术翻译有其特殊性,既与日常语文的翻译不同,也与科技文献的翻译以及文学作品的翻译大不相同。这大概是

^① 本文初稿作于2001年12月10日,部分内容已纳入作者有关学术翻译的两篇文章《后期海德格尔基本词语的汉译》和《我们如何敲打词语?》,载孙周兴:《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增补文本提交给浙江大学主办的“人文学术文献翻译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杭州,2011年11月11—13日)。

没有什么异议的。但“学术翻译的原则”就不好说了，也少见讨论。学术翻译有大家必须遵守的原则吗？难说。不过，做事都要讲个道理的，且不说“一定之规”，总有大概的做法罢。若这样想来，我这个题目还是可以成立的。

我这里就来说说学术翻译的做法，当然不是说要推广自己的什么法子，好像自己有多么高明似的，好像我有多少宝贵经验可传授似的，或者，非把自己的一丁点儿东西发扬光大一下似的。——我哪里敢！只不过自己做事时也经常地、不断地受着种种困惑，往往想之不通，所以愿意端出一些想法来跟大家讨论。

我要讲的是四个原则，即语境原则，硬译原则，统一原则和可读原则。这四项，实际上是我认为在学术翻译中值得注意的四个原则性要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在从事学术翻译时需要注意的四个重要的角度。

一、语境原则^①

学术翻译的第一原则，在我看来应该是“语境原则”。真正做到了这一条，其实译事就已经成了。但显然，这是一个可以松动的、相对的原则，因为语境终归是变动不居的。这里所谓的“语境”，意思又可以分两项：一是原文的语境，就是译者要依原文上下文的“理”和“路”，把本义传

^① 参看孙周兴：《后期海德格尔基本词语的汉译》，载拙著《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9页以下。

达出来,这也就接近于通常所谓的译事之“信”的要求了;二是母语的语境,就是译者应该充分考虑、关注、照顾母语学术的历史性处境,不可妄自僭越,在译名、表达方式的选择和改造上保持一定的分寸,一定的张力。

在我们下面将举出的关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词语”的汉译例子中,有几个就关联到如何服从原文语境的问题。譬如“澄明”(Lichtung)这个词语,是已故的熊伟先生的译法,近几年来颇受人们的怀疑。较典型者,如陈嘉映教授建议把它译为“疏明”,理由只有一个,谓原译名“澄明”带有极强的佛学意味,根本就是一个佛学语汇。更有甚者,因为海德格尔曾经以接近譬喻的方式,把 Lichtung 解为“林中空地”(而且确实的,德语词典里对 Lichtung 一词的释义就是“林中空地”),于是就有人主张:我们不应该把海德格尔的 Lichtung 译为“澄明”,而应译之为“林中空地”。然而,只要看过几页海德格尔原著的,就会发现“存在的林中空地”(die Lichtung des Seins)终究不是好听的、适当的译法,特别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会显得十分别扭。再说,这种译法如何显明原文语境中 Lichtung 与动词 lichten 的基于词根的直接关联呢?海德格尔经常的用法是一组对立,即 Lichtung und Verbergung,译为“澄明与遮蔽”可,但改译为“林中空地与遮蔽”,就近乎发疯了,明显是一种完全不照顾原文语境的译法。还有,我们知道,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文中,海德格尔曾说过:Sprache ist lichtend-verbergende Ankunft des

Seins selbst^①。我们好意思把这个句子译为“语言是存在本身的既林中空地着又遮蔽着的到达”吗？所以，从原文语境来考虑，我以为还是把 Lichtung 译为“澄明”好，既与动词 lichten（澄明）合，也可与 Verbergung（遮蔽）相对应。此外我还提供过一个理由：我们也未必要在佛学意义上了解“澄明”嘛！

另一方面是母语语境的问题。我们都在母语语境里活动、思想或者生活。我们的翻译活动自然要尊重母语和母语语境。我甚至想说，在翻译这件事上，我们必须建立起“母语优先”的原则。有的译者外文并不好，但母语感觉特好，能把译事做得很出色；相反的例证是，有的译者外文很好，竟做出不堪卒读的译文来，原因正在于他/她的母语没过关。我们的经验方式是由母语组建起来的，或者说是以母语为基础的。因此，在翻译这件事上，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母语始终是头等重要的。

我们仍旧拿海德格尔为例。海德格尔著作的汉译，除了错译、漏译、意义偏失等“技术性”毛病会受到应有的责难外，另外还会受到一种责怪：把海德格尔过于“中国化”了。这个责怪本身就值得我们细细考量一番。人们译康德或者黑格尔，好像就没有受到此类的责难。这是为什么呢？值得我们想一想。我且把这个问题先摆在这里。什么叫“中国化”？其实也是成问题的。我认为，至

① 海德格尔：《路标》，美茵法兰克福：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1996年，第 326 页。

少这个责难是一个“无度”或“失度”的责难。这个责难包含着一种“原汁原味”的要求。人们要求看到一个“原本的”海德格尔。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蛮合理的要求，实则不然亦不该。我们汉语思想者研究海德格尔自然要着眼于汉语语境，“做”出来的海德格尔应该是、而且必然是“汉语的海德格尔”——除非你放弃汉语，全盘用西文写作。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为前些年流行的中西哲学文化比较研究中的“拉郎配”现象张目，例如，把海德格尔与老子、庄子、王阳明，甚至朱熹等拉在一起“配种”。这样的“配种”，首先已经设定被配双方是“同类”，最后得出结论确是“同类”。我所谓遵从汉语语境，意在强调两点：其一，中国的西学研究者必须充分地自觉我们的研究的“中国性”或“汉语性”，从思想—语言的共属一体性的角度，去体悟中—西思想之间的近与远，同一与差异。其二，从技术性角度讲，我们在做翻译时，特别在确定译名时，必须照顾到既有的学术语境，例如要充分考虑译名的基本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否则就会流于“无度”。在这方面，目前学界（特别在海德格尔著作的译介中）已出现许多混乱，可谓译名上的“百家争鸣”了。“百家争鸣”当然好，但不可无边无际，乱了方寸。我觉得，这方面最大的问题是，一些人往往以词语的“解释义”代替“翻译义”，譬如前几年有人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代替“人道主义”（Humanismus），有时甚至是故作惊人状，从而动摇了译名的基本恒定性和一贯性，对于学术讨论并无好处。

二、硬译原则

依我的分法,翻译一般采取两法:“硬译”与“软译”^①。当然你也可以说,有“不硬不软”或“亦硬亦软”的译法(那甚至是更高、最高的境界呢!)。但这种折中的“辩证法”往往会流于空转,于事无补的。在实践中,我们常常碰到的不是“硬”的东西,就是“软”的东西。就翻译的“硬”和“软”而言,我原则上还是倾向于鲁迅先生的“硬译”主张的。先生的理由当然也没得说:翻译本来就有改造自家语言和文化的意义在。若是译得与当下的日常语言毫无分别,“软”不啦叽的,则翻译这件事情的意义就失去了一半。

但在这里,我也要补充一句:翻译的“硬”与“软”,也要视具体情况分别对待,主要要看译的是什么。若是文学作品,或者普及读物,是需要让大众喜闻乐见的东西,或者是旨在娱乐群众的东西,我以为以“软”译为妙(虽然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性文本本身也具有学术性,与大众读物有根本的区别),否则就难以达到大众“教化”或者“消遣”的目标(这方面我不太能同意鲁迅先生一刀切的硬译主张)。但对于哲学—思想学术类的作品,我是坚持“硬”

① 我曾经以“上行”与“下行”来表达这里的意思,主张学术(思想)文本和诗性文本的翻译以“上行”为要求。参看孙周兴:《我们如何敲打词语?》,载拙著《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以下。

译的(这方面我仍旧同意鲁迅先生的主张)。哲学—思想类的译文就要“蓄意地”做得“硬邦邦”的,让一般的人们看不懂——因为原著本身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接近的。若是把学术品也译得喜闻乐见,一般说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则学术翻译的意义已经丧失了大半。我想,当年汉唐佛经之译文,也不是当时的平常人可以了解的,但鲁迅先生所说的改造语言的目的,甚至是改造思想文化的目的,最后不也达到了么?学术是为少数人的——这不是什么“贵族主义”,而是文化之“实事”。

硬译怎么个“硬”法,“硬”到什么程度才比较合适,这也是一个问题。翻译与一般做事一样,不会有绝对固定的标准做法。因为毕竟是“手工活”,而不是机器做的事——以后机器(计算机)是不是可以代替我们人类做翻译工作,甚至做文学和学术思想的翻译,我现在还吃不准。据说并非没有可能。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放一放。

我在此愿意强调的是与“硬译”原则相关的一个小原则,即宁取“字面义”而勿取“解释义”。这一点前面已经点到过,这里还值得重复一下。译者从做事的角度出发,一般会倾向于把译文落实于“字面义”;而研究者因为觉得自己比普通译者和读者高明,有时候就比较任意地取了“解释义”,并且会以此来指责译者。比如前述的把Humanism译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见就是这样。我以为是在“捣糨糊”(上海话,意为“瞎搞”)。再比如海德格尔的Ereignis,我自己曾译之为“大道”,是理应受到指责的;后来在国内出了许多个奇奇怪怪的译名,诸如“本有”